

宗号奴隶船事件与 18 世纪末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张秋月^{1*}

(^{1*}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系,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宗号奴隶船事件是一场因淡水短缺迫使船员杀害并丢弃黑奴事件。在 18 世纪末英帝国危机的语境下, 这场抛弃黑奴事件为废奴主义者所利用, 他们试图在法庭上将宗案从商业保险案转变为谋杀案。伴随废奴主义者在法庭上努力的失败, 他们转而诉诸公共舆论, 向社会各界诉说宗案的谋杀性质, 以促成公众对奴隶制的观念的转变。宗号奴隶船事件经废奴主义者反复诉说, 成为 18 世纪末英国废奴运动兴起的催化剂。

关键词:宗号奴隶船事件; 英国; 废奴运动; 帝国危机; 奴隶贸易

The Zong Massacre and the Emergence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Zhang Qiuyue^{1*}

(^{1*}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Zong massacre was a incident in which the crew, compelled by a shortage of fresh water, murdered and jettisoned numerous enslaved Africans.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imperial crisis, this otherwise routine practice of discarding human cargo was seized upon by abolitionists. They attempted to reframe the Zong case in court, transforming it from a commercial insurance dispute into a trial for mass murder.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ir legal efforts, abolitionists pivoted to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Zong as a massacre to the wider public to foster a fundamental shift in popular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slavery. Through its constant retelling by abolitionists, the Zong incident thus became a crucial catalyst for the burgeoning British abolitionist movement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The Zong massacre; Great Britain; Abolitionist Movement; Imperial Crisis; Slave Trade

1. 引言

宗号奴隶船事件⁽¹⁾是一场因船长失误、淡水短缺导致船员将大批黑奴抛入海中的事件。在 18 世纪末的英帝国危机下, 宗号船事件成为英国废奴运动的引爆点, 并在废奴主义者的宣传下被赋予了“大屠杀”的意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英国废奴主义兴起的研究, 要么强调精英人物在废奴运动中的作用⁽²⁾; 要么强调长时段、结构性因素, 鲜少关注具体事件在影响与改变废奴情绪中的关键作用。英国废奴史学家詹姆斯·沃尔文虽用相当笔墨探讨了宗号奴隶船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未将其置于 18 世纪末帝国危机语境下进行考察^[1]。本文将宗号奴隶船事件置于 18 世纪末帝国危机激化的反奴隶制情绪的语境之下, 探讨这场与奴隶贸易紧

密相关的海事保险诉讼如何演变为一场人权诉讼,以及诉讼结果如何推动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2. 18 世纪末帝国危机与英国反奴隶制情绪的激化

18 世纪是英国奴隶贸易的繁荣期。光荣革命后,议会取消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贸易垄断权,英国奴隶贸易年运输总额迅速攀升。1720—1790 年间,英国年均贩奴数额从每年 12000-14000 人增加到每年近 42000 人。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英国奴隶贸易主要市场^[2]。

英国奴隶贸易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活动,而且深深嵌入英国经济结构之中。18 世纪中叶前,鉴于英伦三岛受益广泛、远离奴隶殖民地以及种族歧视等原因,英国绝大多数人对奴隶制废存问题持冷漠态度,社会仅存在零星的“异见”。例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认为奴隶劳动是低效且不正义的。贵格会内部也较早产生了反奴隶制声音,将奴隶贸易定义为“罪恶”,并严格约束宗派内部纪律约束。但在美国革命前夕,这些零散的道德不安并未转化为持续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3]。

18 世纪末英帝国危机打破了大西洋两岸废奴情绪相对沉寂的状态。七年战争后,英国议会为减轻财政负担,要求北美殖民地承担帝国防务责任,颁布了一系列新税法,直接引发北美殖民地抵抗运动的兴起。在该时期英美小册子论战中,殖民地“爱国者”借用奴隶制政治隐喻,逐渐将“印花税”“汤森税”等法律视为英国议会欲把殖民地人民变为奴隶的阴谋^[4]。

然而,英国官方宣传家迅速发觉奴隶制政治隐喻的矛盾之处。他们从殖民地真实存在的奴隶制出发,将殖民地引发的奴隶制政治隐喻论战转变为对现实存在的奴隶制的批判。塞缪尔·约翰逊犀利地评论道,美国人高喊自由却奴役他人,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虚伪。约翰·卫斯理坚称种植园奴隶制是人类堕落的标准,并认为美国人抱怨被议会“奴役”的说法,与奴隶制的不公相比不值一提^[5]。

面对英国官方对殖民地真实奴隶制的猛烈攻击,美国殖民地“爱国者”无法再回避奴隶制这个尴尬的问题。一方面,“爱国者”将奴隶制的责任归咎于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参与的奴隶贸易。本杰明·拉什将非洲贸易公司描述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强盗团伙”,并向其英国朋友解释,结束奴隶贸易是美国对抗“英国暴政怪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北美激进分子开始向殖民地议会请愿,要求逐步废除奴隶制,掀起了北美第一波废奴浪潮^[6]。

这场由殖民地发起的,以奴隶制政治隐喻反抗英国暴政的论战,不仅在殖民地引发了“谁对真实的奴隶制负有责任”,以及“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废奴”等问题的广泛反思,而且在英国也激起同样的反思。“这种臭名昭著的贸易起源于哪里?”苏格兰牧师约翰·厄斯金问道,“它在哪里仍然以贪婪所能激发的热情继续进行?除了在英格兰,还能在哪里?”格兰维尔·夏普认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胁迫,加之英国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奴隶制,给英国带来“不可磨灭的耻辱”^[7]。

对奴隶制罪责问题的反思促使英帝国内部激进主义者走上了废奴道路。美国革命后,英国废奴主义者开始谴责与寻求废除整个奴隶制度。第一代英国废奴主义者的主要实践是“司法废奴”,即将典型司法案件上升为废除英国奴隶制的先例。1772 年,废奴主义者利用“萨默塞特案”宣布英国国内奴隶制不合法,但尚未触及帝国内部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8]。1783 年的“宗案”成为废奴主义者寻求废除帝国内部奴隶贸易的绝佳案例。

3. 引爆点:“宗案”始末及其司法判决

1781 年初,威廉·格雷森(William Gregson)集团的船只“威廉号”抵达非洲,在开普敦海岸进行奴隶贸易。此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的尾声,英国正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交战。一艘名为阿勒特号的英国船只在非洲海岸俘获了几艘荷兰船,其中包括一艘名为佐格号(Zorgue)的荷兰奴隶船。格雷森的合伙人,威廉号船长理查德·汉利代表格雷森集团购买了佐格号,并将其更名为宗号(Zong)。格雷森集团随即购买了宗号船的保险。汉利无意亲自指挥宗号,他任命威廉号的船医卢克·科林伍德担任宗号船船长,并临时拼凑起一支船队。

1781年8月18日，宗号船载着包括船长、船员、乘客罗伯特·斯塔布斯在内的19人，以及442名黑奴，从非洲海岸出发，驶向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段航程”。到1781年11月中旬，宗号船进入加勒比海。此时，由于船长导航误将圣多明各西南部的蒂伯龙角（Cape Tiburon）视为牙买加东南海岸，继续向西行使，导致严重偏离牙买加海岸。

当船员们意识到导航失误后，他们对船上的淡水进行彻底检查，发现船舱底层水严重泄露。面对水资源匮乏的极端局面，船长于11月29日晚8点召集会议，决定为了保全船员和剩余的奴隶，杀害并抛弃部分奴隶。这场有组织的谋杀行动分三批进行，到12月22日抵达牙买加黑河的时候，共杀害了132名黑奴。1782年1月9日，牙买加报纸刊登了出售200名宗号黑奴的广告。

格雷森集团得知宗号船发生的事情后，以“共同海损”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抛弃的奴隶财产，但保险公司不认为此事属于“共同海损”的赔偿范畴，不予赔偿。1783年3月6日，格雷森集团向伦敦市政厅起诉保险公司，此案是为著名的“宗案”^[9]。

1783年3月6日，市政厅举行了一场陪审团庭审。庭审中，船东代表基于“共同海损”理由，即“在航行途中遭遇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将部分奴隶抛入海中是为了保全船只、船员和剩余有价值的奴隶，应由保险承保”，认为保险公司必须赔偿被抛下船只的奴隶价值。大陪审团接受了这一论断，做出有利于船东的判决。保险公司不服判决，理由是：其一，航海日志被故意丢弃，有骗保的嫌疑；其二，唯一证人斯塔布斯的记述存在矛盾之处，如“雨天后仍旧丢下了一波人”，说明不存在水资源短缺的紧急情况。保险公司于是向王座法庭上诉^[10]。

对大陪审团判决不满的不仅仅是保险公司，废奴主义者试图利用该事件，将其转变为一场人权诉讼。1783年3月19日，黑人废奴主义者奥劳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将宗号船的消息告知当时最活跃的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夏普旋即欲用“谋杀罪”起诉格雷森集团，并积极担任保险公司律师的法律顾问^[11]。

1783年5月，在正式开庭前，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主持召开听证会，格雷森集团的律师约翰·李得知保险公司和夏普欲以谋杀罪提起诉讼，于是，他竭力否认将奴隶丢弃的行为是谋杀。他断言“英国法律确实将我们的黑人同胞视为财产”。既然奴隶是财产，那么在缺水的情况下为保全剩余船员和奴隶的性命，杀害一部分奴隶是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被丢弃的奴隶构成了“共同海损”，保险公司必须对其进行赔偿。

然而，保险公司的律师团队并不认可约翰·李的这套说辞。首先，根据现有的商法，强调基于奴隶的赔偿只能是因奴隶起义和镇压起义造成的损失，以“海上风险”的保险原则进行赔偿。奴隶是人不是货物，无法以“共同海损”进行赔偿；其次，缺水是因为是由于船长导航失误与管理不善，是一种人为错误，并非不可避免的风险；再者，保险公司律师认为，宗船罹患之事的有力证据——“航海日志”并非离奇遗失，而是被故意损毁。且根据第一次庭审斯塔布斯的证词，“雨天后仍有一批黑人被丢下船只”，他们推断屠杀奴隶根本不是因为缺水，更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疾病等）导致奴隶价值贬损，故意丢弃一些失去市场价值的奴隶，以骗取保险^[12]。

接着，他们遵循夏普顾问的建议，强调宗案并非仅为骗保案，更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在讨论供水问题时，皮戈特律师断言：“只要还有水可以分配，这些船员（非洲人）就有权分得一份，就像船长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他认为，“无论肤色与种族如何，人类的生命是等价的”。海伍德律师以“全人类事业”之名为黑奴发声，认为恣意抛弃132条生命的行为令世人愕然。皮戈特律师总结道：“如果赔偿成立，那将是对那些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欺詐与压迫行为”^[13]。

主持听证会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始终坚持由他作出的法律声明不应损害英国的商业繁荣。因此，他将此案严格限制在商法之中，避免定性为谋杀案。他认为奴隶在商法中就是财产。但同时指出此案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奴隶是否是财产”的问题，而是“由船长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他评论道：“我被告知，如果他们自然死亡，则不予赔偿；但如果他们在袭击中被杀，被保险人将获得与货物损失相同的赔偿。”宗案最终确立了一个司法原则：因船长失误造成的损失无法索赔^[14]。

4. 大屠杀叙事的散播与英国废奴运动的兴起

虽然夏普和保险公司律师在法庭上将宗案定性为谋杀案的努力失败了,但废奴主义者绝不允许此案在公共视野中销声匿迹,竭力让公众了解宗号船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影响公共舆论。格兰维尔·夏普成为宣传宗号大屠杀的急先锋。首先,他将庭审记录详细整理出来,借助报刊等媒体扩大宣传范围。其次,他将庭审记录副本邮寄给主要政要,以期影响当局对奴隶贸易的态度。他提醒海军部,宗号大屠杀是“极端邪恶的”,任何为杀人行为辩护的理由都是“可恶的教条”,要求他们调查这起大屠杀;并敦促首相波特兰考虑“废除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15]。最后,夏普将目光转向英国教会,向其宗教界同仁控诉宗号船发生的不人道行为。切斯特主教贝利比·波特厄斯受夏普启发,将美国独立战争视为上帝对英国不义行为的惩罚,并将奴隶制视为核心原因。因在上议院发表自由言论而闻名的彼得伯勒主教约翰·欣奇利夫评论道:“这是我读过的最不人道的暴行之一……如果宗教和人性得到关注,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交易将会中止”^[16]。

受夏普等人对宗号大屠杀叙事散播的影响,一些曾与奴隶贸易利益攸关之人听闻此事后也颇为愤慨。曾在利物浦的奴隶船上工作的约翰·牛顿评论道:“一想到宗号事件就感到不寒而栗……我们听说并读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一百多名成年奴隶在船上因淡水短缺而被抛入海中”;曾为利物浦奴隶贸易商的办公室职员乔治·格里高利也震惊于“这起骇人听闻的行为竟未受到惩罚”。他随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对于那些认为缺水是屠杀行为正当理由的人,我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如果那些受害者是白人而非奴隶,他们会被扔下船吗?”^[17] 牛顿与格里高利的态度表明,即便曾近距离接触过奴隶制之人,也为宗号大屠杀的残忍程度深感不安。

大屠杀叙事的散播同样让非裔英国人倍感震惊。例如,黑人废奴主义者埃奎亚诺的朋友奥托巴·库加诺对执行大屠杀的英国人的自私和残暴进行猛烈地鞭挞。他认为,“英国人对奴隶犯下的谋杀罪,伴随着一种令人震惊、奇特且几乎闻所未闻的概念,根据这些行为者的观念,他们要么认为黑人是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无论生死;要么认为夺走一个黑人的生命与夺走一只野兽对生命并无二致”^[18]。

更重要的是,宗号大屠杀叙事的散播影响到了新一代废奴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为剑桥大学学生的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84年,剑桥大学副校长彼得·佩卡德牧师设立了一项拉丁文论文奖,题为《强迫他人成为奴隶是否合法?》,克拉克森接受了这项挑战。在研究过程中,他被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所震惊。受良心驱使,他决定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废奴事业。他将自己的拉丁文论文翻译成英文,修订并扩展后出版,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废奴运动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经验性、数据化的证据,揭示奴隶贸易的残酷真相^[19]。

在宗号船事件发生四年后,即1787年,以贵格会成员为主导,包括夏普在内的废奴主义者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收集和传播有关奴隶贸易的信息和证据,以争取公众支持。克拉克森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收集的大量数据和证人证词,通过协会的出版物(小册子、报告、文章)被广泛分发,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奴隶船上真实情况的了解。协会还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运动,成千上万的签名请愿书涌向议会,向政治家施压。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与议会内部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代表的政治家的努力相结合,最终促成了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令的出台^[20]。

注释:

(1) 国外史学界大多将该事件描述为“The Zong Massacre”,直译为“宗号船大屠杀”。但笔者认为,“大屠杀”一词实乃废奴主义者以及后人对此事件的定性与宣传,带有废奴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后见之明的道德评判。为客观描述此事件,笔者将该事件中译译为“宗号奴隶船事件”。

(2) 国外研究参见:Reginald Coupland,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3.; Roge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 Macmillan, 1975.;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Betty Fladeland, *Men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Antislavery*

Cooper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2.;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国内研究参见: 张倩. 威廉·威尔伯福斯与英国废奴运动 (1787-1833) [D]. 苏州科技大学, 2022.; 金海. 萨默塞特案件与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的发展[J]. 安徽史学, 2020, (03):129-139.; 张旭. 英国大众废奴运动 (1787—1807) 文献述评[J]. 英国研究, 2021, (02):55-78.; 田小玉. 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废奴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探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参考文献:

- [1]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2] David Richardson, “The Slave Trade, Sugar, and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48-177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7, no. 4, (Spring, 1987), pp. 739–769.
- [3]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104.
- [4] 伯纳德·贝林.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M], 涂永前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35-147页.
- [5]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15–119.
- [6]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20-123.
- [7]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p. 155–208.
- [8] 金海. 萨默塞特案件与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的发展[J]. 安徽史学, 2020, (03):129-139.
- [9]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56-101.
- [10] Daniel H. Park, “The Zong Massacre 1781: The Legal and Public Debate Surrounding the Moralit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Vol. 8, no.1, (Jan.,2023), pp. 11-28.
- [11]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77.
- [12] H. Farber, “Slave Trade Insurance in the Age of Abolition: Archives, Politics, and Legalities.”, *Slavery & Abolition*, vol.44, no.2, (Apr.,2023), pp. 350–376.
- [13]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44.
- [14] S. Todd Lowry, “Lord Mansfield and the Law Merchant: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7, no. 4, (Dec., 1973), pp. 605–622.
- [15] Michelle Faubert, *Granville Sharp's Uncovered Letter and the Zong Massacre*, Palgrave Pivot Cham Publisher, 2018, pp. 14-21.
- [16] Michelle Faubert, *Granville Sharp's Uncovered Letter and the Zong Massacre*, Palgrave Pivot Cham Publisher, 2018, pp. 22-58.
- [17]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60-180.
- [18] Prince Hoare, *Memoirs of Granville Sharp*,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Colburn, 1820, p.63.
- [19] James Walvin, *The Zong: A Massacre, the Law and the End of Slave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1-205.
- [20] Jeremy Krikler, “A Chain of Murder in the Slave Trade: A Wider Context of the Zong Massac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57, no. 3, (Dec., 2012), pp. 393–415.